

書評：《燭頌——與中國的相遇和友誼》

溫順天著 陳愛潔譯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四日，梁作祿神父的朋友、同事和學生齊集米蘭，慶祝他的八十五歲生辰。其中一項慶祝活動，就是贈送這本《燭頌——與中國的相遇和友誼》。梁作祿神父誕辰八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內容是梁神父的三十多位好友撰寫的學術文章。

等待是人生的一部份。這無疑構成梁神父一生相當大的部份。他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晉鐸，成為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的時候，中國仍向外國教會人士開放。梁神父在羅馬傳信大學供讀了一年傳教學之後，從遠處注意到共黨軍隊迅速戰勝國軍的消

息。很多外國傳教會仍可以派遣一些在一九四八年晉鐸的會士前往中國。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即下一班神父晉鐸時，傳教士再沒有理由要購買前往中國的船票了。

然而，等待並非意味著浪費時間。梁神父在意大利做牧民工作，並為一份傳教刊物撰寫文章。他終於在一九五六年底飛往香港。當時中國仍是封閉的，所以，他在香港學習廣東話和做傳教工作。一九六五年，梁神父被召回意大利，擔任宗座外方傳教會總議會成員。他任這職位達十二年之久，並於

一九七八年重返香港。

他這時候回到香港，可謂正合時宜。中共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黨大會，開始改革和開放過程，而香港就是中國的門階。梁神父在當時的香港主教已故胡振中樞機的鼓勵之下，於一九八零年成為聖神研究中心的創會成員；中心的宗旨是推動世界其他地方瞭解中國文化和天主教會的新處境。梁神父潛心研究中國天主教史和初期傳教士的工作。他亦大力幫助愈來愈多想前往歐洲進修的中國籍學者和修道者。

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一年間，梁神父被召回羅馬，擔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開辦的羅馬宗座傳信大學修院（Collegio Urbano Seminary）的院長。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間，他在意大利天主教主教團設於維羅納的傳教推動中心工作。多年以來，甚至直至目前，梁神父一直積極參與多個有關中國天主教會的會議，經常在會上發表學術論文。

耶穌吩咐他的門徒，要讓他們的「光當在人前

照耀」（瑪 5:16）。有些中國畫以燃點的蠟燭為主題。其中一款傳統畫作，就是寫上「燃盡自己照亮別人」的字句，出現在這本《燭頌》的封面。這象徵梁神父「對中國的終身傳教承諾已啓發很多人，因而在多方面激勵他們。」（頁8）

馬雷凱和柯毅霖兩位編輯把該書分為五個部份，「代表梁神父的生平及工作的特定領域。」（頁3）其中第二及第三部份，是討論古代及近代中國天主教史，尤其給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些部份記載了中國天主教史不同時期的珍貴資料，例如：唐朝的景教時期，明清的耶穌會時期，以及傳教士在鴉片戰爭後返回中國的備受爭議的時期。

在第一部份，馬明哲（Matteo Nicolini-Zani）撰寫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是關於基督徒隱修文學傳入中國。這是在唐朝開始，當時一些有關苦修的著作，例如由敘利亞文翻譯成粟特語（Sogdian）的《沙漠教父語錄》（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是信友的精神食糧。其後，耶穌會高一志

(Alphonse Vagnone, 1566-1640) 神父編輯和出版《天主聖教聖人行實》(The Lives of 72 Saints) (一六二九年)。馬明哲的書目甚至包括至現代，提及奧圖爾 (George Barry O'Toole) 神父於一九二五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向中國介紹本篤會隱修生活」。

柯蘭寬 (Claudio von Collari) 提供一篇長達四十五頁的精彩文章，結集了她在布雷西亞 (Brescia) 的奎里安那圖書館 (Biblioteca Queriniana) 所找到有關中國禮儀之爭的文獻。她詳細回顧禮儀之爭的主要步驟，大致在一七零零至一七二零年之間發生。這包括教宗特使鐸羅 (Tournon) 率領的代表團與康熙皇帝之間注定失敗的會面。作者的能力很強，能夠來回描述某個文獻的內容，然後把它置入禮儀之爭的整個過程中。她的文章是那麼全面徹底，竟然能夠列出某份文獻的所有收件人的名字，和所有簽署人的名字——以及這些人物在教會或社會中擔任的職位。這篇文章如此引人入勝，以致筆者發現自己也不自覺地查看自己的歐洲祖先是否這

些文獻的收件人或簽署人！

高華士 (Noel Golvers) 則撰寫了一篇名為 *Litterae Indipaeae* 的有趣文章，內容是一批比利時福蘭德省的耶穌會神父和初學生寫信給長上，希望獲准派往中國工作。閱讀這些耶穌會士要求派往中國的理由是有趣的。高華士指出，中國的受歡迎程度，時常與某位耶穌會傳教士從中國返回歐洲相符合，因為傳教士在中國工作的故事很吸引學生，讓他們十分雀躍。

第二部份是透過中國教會史而繼續《燭頌》的路徑。魯保祿 (Paul Rule) 提醒今日的教會，應該意識到昔日所犯的錯誤，尤其在「適應」這一方面。他認為，其中最刺目的，就是禮儀之爭。他也指出，由首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在一六九一年逝世，直至一九二六年再委任中國籍主教之間，經歷了二百三十五年。他寫道，在擢升中國籍主教這方面，有應該做得更多。

狄德滿 (R.G. Tiedemann) 為《燭頌》撰寫的

文章，花了較多篇幅來討論本地聖職人員的發展不足的問題。對於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期間，外國傳教士不願意提升中國籍聖職人員到聖統制的職位，狄教授假設很多理由。最後，羅馬要介入，並且透過一九一九年頒佈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 通諭，以及在一九二二年委任剛恆毅 (Celso Costantini) 為宗座駐華代表，實際上迫使那佔盡天主教聖統制高位的外國傳教士同意接納中國籍主教。

周萬里 (Agostino Giovagnoli) 在他討論「東進政策」(Ospolitic) 的文章裡，講述卡薩羅利 (Agostino Casaroli) 樞機擔任教廷國務卿 (二十世紀六十及七十年代) 的時期，並詳盡分析「東進政策」，即卡薩羅利所推行、與東歐共產政權有關的政教關係政策。透過這項政策，卡薩羅利嘗試保持東歐教會與羅馬合一。他渴望與這些地方的教會團體維持接觸，即使沒有實質的成果。他的部份政策，雖僅僅踏出「小步伐」，卻令人滿意。在實踐「東進

政策」時，「忍耐」也是一個起作用的詞語。這政策也可應用於現時梵蒂岡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涉及委任主教等教會事務。

宗座外方傳教會曾祺光 (Giancarlo Politi) 神父在談及主教時，發表一份非常有用的名單，列出三百四十位在中國出生的主教，由一六七四年擢升羅文藻主教，經過一九二六年祝聖六位國籍主教，一直至二零零七年底的歷史。曾神父的名單包括每位主教的出生日期、晉鐸及晉牧日期、授予聖事的主教名稱 (如知道)，以及他們的教區和教省名稱。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間，在中國沒有祝聖主教典禮舉行。今年，直至目前為止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八日)，已祝聖十位年輕主教。

只要看到第二及第三部份的文章，梁神父的《燭頌》應該是一本廣受每位中國教會史學生歡迎的書籍。當然，該書的其他部份亦記載了多篇有深刻見解的文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柯毅霖神父搜集梁作祿神父六十年來的著作。柯神父列出四

百一十七篇作品，涉及的主題相當廣泛，由傳教工作以至中國的宗教歷史和政策。梁神父的著作數量龐大。《燭頌》是一本很具價值的書，不但向梁神父致敬，也向多位提供如此資料豐富的文章的學者致敬。

《燭頌》的校對工作近乎完美。僅有些微的地方出現誤差，就是衛方濟 (François Noël) 是否在一六八七至一六九零年期間訪問日本 (頁 160)。日本在一六三五年至一八五三年與世界隔離，只容許荷蘭船隻訪問長崎，但船上並沒有傳教士。若望保祿二世不是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教宗 (頁 389)。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七八年任教宗的比約九世才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習慣說八年抗戰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而不是十四年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五年) (頁 450)。

有一位朋友以中文撰寫關於梁神父的文章。其他的文章全都是英文，引文是拉丁文、法文和意大利文。這份學術性文本亦包含了充足的拼音和中國

字。該書的後面列出廿八位作者和他們的地址。如果能夠簡介每一位作者就更好。可惜沒有索引。

至於如何購買該書，可參閱上一期的《鼎》(二零一零年秋，158期) 英文版的「新書推介」。 □